

中国

现当代文学概观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学系
汉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之一



春风出版社

CHUNFENG CHUBANSHE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观

林 凌

海 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观/林凌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8

ISBN 7-80597-363-6

I. 中… II. 林… III. ①文学史—中国—现代

②文学史—中国—当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893 号

书 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观

著作责任者: 林凌著

标准书号: ISBN 7-80597-363-6/I·48

出版者: 海风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350001

印刷者: 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54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上编 (1917—1949)

第一章 现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1)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运动	(1)
第二节 左翼文学运动	(12)
第三节 抗战文学运动	(23)
第二章 鲁迅	(34)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34)
第二节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38)
第三节 杂文	(44)
第三章 郭沫若	(50)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50)
第二节 《女神》	(53)
第三节 历史剧	(59)
第四章 现代新诗	(63)
第一节 胡适 刘半农	(67)
第二节 闻一多 徐志摩	(69)
第三节 李金发 戴望舒	(75)
第四节 殷夫	(80)
第五节 艾青 臧克家	(83)
第六节 《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	(91)

第五章 现代小说	(98)
第一节 叶绍钧 许地山 王统照	(102)
第二节 郁达夫	(107)
第三节 茅盾	(111)
第四节 柔石 叶紫 张天翼	(119)
第五节 巴金	(126)
第六节 老舍	(133)
第七节 沈从文 丁玲	(138)
第八节 赵树理 孙犁	(147)
第九节 沙汀 钱钟书 张爱玲	(152)
第六章 现代散文 戏剧	(159)
第一节 冰心 朱自清	(162)
第二节 曹禺	(166)
第三节 田汉 洪深	(170)
第四节 夏衍 陈白尘	(174)
第五节 《白毛女》	(178)

下编 (1949—2000)

第七章 当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182)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运动	(182)
第二节 “文革”十年的文学运动	(192)
第三节 新时期文学运动	(196)
第八章 当代诗歌	(201)
第一节 郭小川 贺敬之	(205)
第二节 闻捷 李瑛	(210)
第三节 艾青	(214)
第四节 朦胧诗	(219)
第九章 当代小说	(223)

第一节	杜鹏程 吴强	(228)
第二节	梁斌 杨沫	(233)
第三节	赵树理 柳青 周立波	(239)
第四节	李准 马烽	(247)
第五节	王愿坚 峻青 茹志鹃	(251)
第六节	刘心武 王蒙	(257)
第七节	张贤亮 谌容 古华	(264)
第八节	蒋子龙 高晓声 张洁	(272)
第九节	贾平凹 韩少功 阿城	(278)
第十节	徐怀中 李存葆 朱苏进	(282)
第十章	当代散文 报告文学和戏剧	(292)
第一节	杨朔 秦牧 刘白羽	(296)
第二节	魏巍 邓拓	(301)
第三节	老舍 田汉	(304)
第四节	巴金	(309)
第五节	徐迟 理由	(311)
第六节	沙叶新	(315)
后记		(318)

上编 (1917—1949)

第一章 现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运动

一、文学革命的兴起

开始于1917年的“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思想革命的要求而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正式开端。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从改造国民的思想意识入手，于是，他们发动了晚清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和“二次革命”失败，使“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积淀于国民头脑里的封建伦理思想是阻碍和制约开展政治革命的重要因素，中国历次政治革命之所以屡屡遭受挫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就是因为广大国民没有彻底的伦理觉醒。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新青年》是最早应启蒙运动需要而诞生的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阵

营进攻的重要阵地。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杂志上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热情宣传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出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由于孔子学说已经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而且当时的军阀政客和保守派知识分子正在鼓吹“尊孔读经”，甚至要把“孔教”列入宪法，因而，《新青年》掀起了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孔子之道和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一方面揭露袁世凯、康有为等人企图通过宣扬孔教恢复帝制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孔教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内在联系及其与现代生活、民主制度的尖锐对立。反对旧道德和提倡新道德，是“五四”启蒙运动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十分重视向青年宣传西方近代各种思想学说，如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易卜生的个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等。当时，他们对这些学说还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但这些学说作为反对封建道德的思想武器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值得肯定的。

思想领域革命引起了文学领域革命。1917年初，《新青年》高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大旗。这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认为，文学改良应该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篇文章体现了破旧立新的精神，所提倡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主张，得到了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和积极响

应。1918年，他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他断言“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希望“有志于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胡适积极倡导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对创造白话文的必要性作了较为透彻的论述，较之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胡适的文学主张及其文学实践，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胡适的基本倾向是改良主义。他极力宣扬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改良主张，很少涉及文学内容革命，更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旧文学中的封建思想。离开文学思想内容的改革，就不可能获得文学革命的成功，因为封建思想既能用文言文表达，也能用白话文表达。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大主义”的某些提法虽然不够严密、准确，但它涉及到了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两方面的革新，触及到文学革命的某些本质性内容。比如，用国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涉及到文学的平民化问题；用写实文学取代古典文学，涉及到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用社会文学取代山林文学，涉及到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文学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提出以小说、戏剧为文学正宗，斥桐城派、文选派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增多诗体”、“重造新韵”、分段以及使用标点符号等主张。为了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1918年3月,《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目,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所写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此文集中了“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封建文人们反对文学革命的各种论调。另一篇是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所写的《复王敬轩书》,代表新文学阵营对封建文人们的种种反动论调,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文学革命是从文学形式改良入手,但形式改良必须为内容革新服务。鲁迅1918年11月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1919年1月发表的《随感录四十三》又进一步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鲁迅提出的“改良思想,是第一事”的主张,是极其深刻的。从1918年底到1919年初周作人先后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作者“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主张“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人人都过“灵肉一致”、“利己又利他”的幸福生活。虽然这种主张的哲学基础是进化论和人性论,但当时它已经是非常新颖而系统的理论主张了。《平民文学》要求新文学去描写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引导人们都来遵守“自立与互助”这种“人”的道德,实际上还是他所主张的人的文学。此外,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等文章,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新文学观。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的运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

宣传马克思主义，寻找改造中国的新道路。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论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改组，除原任编辑陈独秀外，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先后参加编辑工作。从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起，《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文。以《新青年》为核心，新文化运动逐渐成为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统一战线的文化运动，指导思想也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919年12月，他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分析当时新文学创作状况。他指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应建筑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的“土壤根基”之上。

新文学创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以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深刻批判，及其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郭沫若的新诗，体现了“五四”要求个性解放、破旧创新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总之，经过新文化阵营的共同努力，新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人估计，1919年，全国出版了400多种白话文报纸，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报纸副刊。虽然这些杂志和报纸副刊的政治立场不尽一致，但它们都提倡白话文，都刊载新文学作品，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只好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二、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反对封建文学的革命。它是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内容、文学语言形式的大解放、大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从禁锢束缚状态走向自由开放，从闭关锁国状态面向世界，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崭新时代。在“五四”文学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以后，新文学阵营通过与封建复古势力斗争及其新文学阵营内部论争、分化，巩固和深化了“五四”文学革命成果；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对封建复古势力的斗争及其新文学阵营内部论争、分化

在第一个十年，新文学阵营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主要有三次。

1919年，封建复古文人林纾，发表公开信《致蔡鹤卿书》，提出新文学倡导者的两条罪状：一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二是提倡白话文。他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发表小说《荆生》、《妖梦》，隐射、攻击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把打击白话文运动的幻想寄托在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的心腹爪牙徐树铮（林纾的门生）身上。新文学阵营对林纾的进攻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每周评论》第十七号、第十九号，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的特别辑录；《新青年》也辑录了林纾等人的谬论，刊于“什么话”一栏。李大钊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中严词痛斥林纾之流的“顽固鬼祟”，指出：“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

残这些青年的精神。”鲁迅写了许多杂文批判国粹派。在《现在的屠杀者》中，揭露林纾之流反对新文学运动的行径，不过是“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蔡元培在《答林君琴南函》中，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说：北大教授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导学生，教授们也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北大并没有“尽废古书，专用白话”，何况白话能达古书之意，而提倡白话的教授也都博览群书，能作古文。

1922年1月，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创刊于南京，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史称学衡派。学衡派成员都是欧美留学生，以“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标榜。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攻击新文化运动，反对言文合一，称文学革命倡导者“浅陋”。鲁迅、沈雁冰等纷纷著文予以批驳。沈雁冰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中，以广博的西洋文学知识，驳斥了“言文不应合一”的谬论。在《驳反对白话诗者》中，他列举反对白话诗的种种论点，一一加以驳斥。第一，学衡派认为诗应该有“声调格律”，并“运用声调格律以泽其思想”，沈雁冰巧妙地反驳说：“思想怎样可以运用声调格律来‘泽’它？难道一有了声调格律，不好的思想就会变成好的么？难道这就称是‘泽’么？”第二，学衡派诬“白话诗即拾自由诗的唾余”，沈雁冰辩证地说：“白话诗固与自由诗同，要破弃一切格律规式，但这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从而”，并赞颂“近代欧美文学史上早已填满了这些自由诗作者的大名”。鲁迅的《估“学衡”》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抓住梅光迪等人文章中的谬误——加以剖析，揭露了他们的“学贯中西”的伪装和不学无术的假学究面孔。鲁迅幽默地指出：“诸公揶揄新文化

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愧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经过新文学阵营的无情批判，学衡派声名狼藉，《学衡》杂志虽然还照常出版，但已经名存实亡了。

继学衡派之后，向新文化运动发起进攻的甲寅派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7月以周报的形式在北京复刊《甲寅》杂志。其内容杂载公文、通讯之类，正如鲁迅所说：“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章士钊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中，赞美文言，非难白话，攻击新文化运动。鲁迅、成仿吾、郭沫若等著文批判了这个复古主义思潮。鲁迅写了《十四年的“读经”》、《答KS君》、《再来一次》等文章，仍然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暴露章士钊文章用错成语、误解古文的事例，打退了打着复古旗号的反动派的进攻。

这期间，在新文学阵营内部，由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差异，发生过激烈的论争。在二十年代初期文言和白话之争中，胡适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既是国故运动的鼓吹者，又是各种复古派攻击的对象。1919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要多研究些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等具体的问题，而不要高谈主义。其实质就是宣传实验主义改良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1922年，他又创办了《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后又创办《国学季刊》，进一步鼓吹“整理国故”。他还在《晨报副刊》上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阅读书目》，给青年学生列了大批古书，形成了一股“整理国故”的思潮。“整理国故”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正如沈雁冰所说，

这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胡适大肆宣扬“整理国故”，势必引导青年脱离政治运动，钻入故纸堆。因此，当时新文学界主要从政治角度批判了“整理国故”运动。李大钊、肖楚女、郭沫若、成仿吾、沈雁冰等著文，揭露了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质。鲁迅的《忽然想到（六）》击中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要害：“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鲁迅接着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全都踏倒它。”1924年，胡适又与陈源、徐志摩等人合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现代评论》评论女师大事件时，非难学生运动，偏袒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和章士钊。鲁迅和《语丝》同人之与展开了论战。这表明，胡适已经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正从新文学阵中分化出去。

（二）“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大量涌现

“五四”时期没有出现专门的文学社团，也没有专门的文学刊物，《新青年》以及随后出现的《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都是综合性刊物。1921年以后，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才大量出现，标志着文学革命的深入。据统计，1921年至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数以百计，文学刊物有好几百种。

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是文学革命以后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会员有170余人，其中有朱自清、冰心、庐隐、老舍等人。文学研究会把革新后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文学旬刊》和《诗》

月刊等，并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在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时，也反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主张文学为人生。因而，文学研究被称为“为人生”的艺术派。文学研究会还大力翻译、介绍俄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月报》曾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以及《泰戈尔号》等特号、专号或专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主要成员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创造社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十余种刊物。创造社在文艺思想上倾向于浪漫主义。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编辑余谈”中说：“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这句话反映了创造社成员对文学创作的共同态度。他们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提倡文学无目的论，追求文学的全与美；同时，他们也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重大使命。创造社介绍过歌德、海涅、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也介绍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文艺思潮。创造社成立以后曾就创作、翻译和文学批评等问题与文学研究会发生过争议，其中不免有门户之见、宗派主义作怪，但也的确反映了两个社团文艺主张的不同。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创造社开始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到1928年，成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力量之一。

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文学社团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外，还有鲁迅参与的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和他所支持的浅草社、

沉钟社等。语丝社因1924年11月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成员主要有鲁迅、周作人、孙伏园、川岛、林语堂等人，他们的观点不尽一致，还发生过争论。但在鲁迅的参与和支持下，《语丝》不仅成为新文学阵营反对封建复古派、“现代评论派”的重要阵地，而且《语丝》以其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即“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莽原社因1925年4月创办《莽原》周刊而得名，它的主要成员有高长虹、向培良等人，鲁迅主编的《莽原》注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高长虹等背叛鲁迅后，鲁迅将已经停刊的《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交未名出版社出版，成为未名社的刊物。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夏天，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人。未名社的政治态度比语丝社急进，主要成就在翻译方面，尤其注重介绍、翻译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浅草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为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出版《浅草》季刊和《文艺旬刊》。1925年秋天，浅草社部分成员又与杨晦、蔡仪等另行组织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并发行《沉钟文艺丛书》。鲁迅称这两个社团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说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是新月社。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前期曾以聚餐会、俱乐部的形式存在过，但并无明确、严格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围绕着《现代评论》周刊、徐志摩接编后的《晨报》副刊、《新月》月刊而形成的一个知识派别，成员主要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分子。新月社以1927年为界限分为前后期。前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陈源、朱湘等。新月社大部分成员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反对封建军阀，又对社会主义思潮怀有恐